

清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 与粮台的设置及其特点^{*}

赵 心 愚

清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在川藏道上设置汛塘、粮台是清治藏战略实施中的一项重大行动,既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时期清中央政府几次用兵西藏及加强西藏治理之需,又为之后此道的长期运行与管理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有其历史背景,具体实施也有一过程,并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康熙末年至雍正时期川藏道上设置汛塘、粮台不仅仅是保障内地与西藏的人员往来、信息传递,还具有多方面的性质与职能,对清中央政府之后治理西藏与康区沿途地区均有重要意义。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对这一时期川藏道上汛塘、粮台的设置有较多记载,有重要史料价值。

关键词:清朝 西藏 川藏交通 汛塘 粮台

作者赵心愚,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 610041。

康熙末年,清政府出兵西藏驱逐侵藏的准噶尔部军队,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雍正年间,清政府再次出兵西藏迅速平息阿尔布巴事件,妥善处理西藏内乱,之后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并在藏长期留驻军队。康熙末年与雍正时期用兵西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治藏措施之所以能得到推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内地入藏大道的开辟与畅通。清代入藏大道主要有青藏、川藏及滇藏三条道。这三条大道中,由于川藏道采购粮食较为容易,沿途又宜于放饲牲口,加之“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内背腹地,外环土司,故驻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为正驿”。^① 据记载,康熙末、雍正初一些官员、将领即使是从青藏道入藏,返回内地时也多选择或要求走川藏道。^② 对于清代川藏道及其汛塘、粮台的设置与管理,近几十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公开发表了研究成果。从其成果来看,多是对川藏道乾隆年及其之后时期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ZDA15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获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9XWD-B0304)。

① 光绪《西藏图考》卷之二《西藏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8页。

② 《藏程纪略》写于康熙六十年(1721),为清代进藏纪程最早之作,其作者焦应旂即由青藏道进入西藏再由川藏道返回内地。其文最早载和宁印本《西藏志》,吴丰培辑入《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藏纪概》成书于雍正初年,为清代成书最早的西藏方志,其著者李凤彩也是从青藏道入藏,再从川藏道返回内地(《藏纪概》,《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又,《清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壬午条记,平定西藏后,由青藏道入藏官兵要求从川藏道返回,此请不仅得到批准,康熙皇帝还同时下令由滇藏道入藏的满兵亦从川藏道撤回。

出看法,对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设置的相关情况则明显关注不够;从其所据材料看,对成书较早的雍正《四川通志》及乾隆初年成书的《西藏志考》《西藏志》中的材料未加以注意。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是清治藏战略实施中的一重大行动,既有力保证了用兵西藏及加强西藏管理之需,又为之后此道的长期运行及管理打下了重要基础。因此,非常有必要依据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中的材料对川藏道汛塘、粮台在这一时期的设置及相关情况作一专门探讨。

一、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及粮台的设置

所谓川藏道,是指内地经四川与西藏地区往来的交通线,终点为西藏拉萨,而起点则有两说,一是以四川成都为起点,一是以打箭炉(今康定)为起点。清代首部西藏地方志《藏纪概》以成都为川藏道起点并记其沿路情况,而乾隆末年刊行的《卫藏图识》中则采取分段记载办法,成都至打箭炉另作一段记。^① 根据川藏道沿途各方面情况并结合粮台是从打箭炉开始设置的这一特定事实,本文的探讨将以打箭炉作为川藏道起点。

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川藏道沿途已设有多个“汛”。汛本为清代兵制中最基层的单位,由绿营兵低级军官千总、把总或外委率兵驻防。汛之下设有“塘”,每汛管辖数量不等的若干个塘。川藏道上的塘又可称之为“塘铺”。如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分地记川藏道沿路各地,各地均设有“塘铺”目。铺,本指急递铺,但其所记内容中皆只称塘,可知所谓塘铺当时川藏道沿路即指塘。^② 除可称为“塘铺”外,川藏道上的塘还可称作“塘站”或“站”。如王我师《藏炉总记》中先有“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语,后又言从打箭炉至西藏“共计八十七站”。^③ 乾隆初成书的《西藏志考》中有“台站粮务”一目,从其中“自打箭炉至藏共设塘站八十四处”一语看,台站即塘站,但也可能当时是将塘与汛合在一起俗称为台站。^④ 川藏道上粮台的性质本文后面将讨论,这里想指出的是,在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西藏志考》中粮台一词均未见,皆记作粮务。如《西藏志考·台站粮务》不仅标题作“粮务”,内容中亦称“粮务六处”。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在沿路各地“公署”目中还记有“粮务署”,也不称粮台署。在稍后出现的《西藏志》中,才有了“粮台”目,但内容与《西藏志考·台站粮务》中的“粮务六处”同。清代军事行动中安设的转运粮秣、饷粮的随营机构又称“军台”。从文献记载看,军台与粮台实际上是有区别的,粮台为常设,军台则为非常设。

学术界现一般认为,康熙时期清已开始川藏道上设置汛塘,并着手解决驻藏军队所需粮草等的供应问题,尤其是康熙末年出兵西藏,汛塘在川藏道沿路的大批设置确保了交通畅通,也使川藏道在清代治藏大战略中作用凸显,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史志文献中相关材料很少,康熙年间川藏道沿路汛塘及粮台的设置情况并不清楚,各汛塘驻守官兵的情况史志中也缺乏具体的记载。焦应旂《藏程纪略》中记有从拉萨到成都沿路的情况,其中也提及一些塘铺,如明确记有里塘与巴塘之间的“大所塘”(大所塘又记作“大朔塘”“大树塘”)。这说明,

① 乾隆《卫藏图识·图考上卷》“程站”,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

② 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志》,四库全书本。

③ 王我师:《藏炉总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有研究者认为《藏炉总记》应属早期西藏地方志。参见肖幼林、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地方志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④ 乾隆《西藏志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影印版。

康熙末年已设有塘铺,但所设塘铺当时有多少塘兵焦应旂文中未详记,沿途共设多少汛塘与粮台其文更未作全面记载。

王我师的《藏炉总记》中有一段记康熙末年川藏道上塘站的设置情况,是一重要材料。其文称:“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交易,以是成为通衢也。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以炉为始,总计理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硕板多、拉里,前抵西藏,此官兵仓储地,共计八十七站。”这段文字中的“站”,可能既指塘铺又包括汛,甚至还将粮台、军台也列入其中,因为设有粮台的几个地方,这段文字中都提及,还明确谈到了“仓储地”。王我师的《藏炉总记》虽时间稍晚,但距康熙五十八年不久,所言的康熙末年川藏道的有关情况应有所依据。《清圣祖实录》中,有一条材料也谈到康熙末年川藏道上的相关情况,亦有重要价值并可印证。记载称:“议政大臣等议复:署理四川巡抚色尔图疏言:‘从前平定西藏,留兵防守,自打箭炉至拉里,曾将四川绿旗、土司番兵共留三千五百余名,挽运粮饷。今解藏钱粮可敷二、三年之用,且藏地可以采买米粮,不必多人挽运。但自打箭炉至拉里设有六十六站、不可无兵防守。臣通计各站酌量驻兵。并将土司番兵亦添入数内,一同驻扎,共需兵一千九百名。其余兵丁一千六百名若行撤回、则钱粮亦可节省。’应如所请。”^①色尔图此上疏中所言的“从前”,应是清首次由四川出兵西藏时,距其上疏仅几年,上疏者身份又为署理四川抚巡,材料应具有可靠性。从出兵西藏到其上疏之时清在打箭炉至拉里之间共设置六十六站,这一数字与王我师文中说的不一致,当因主要是止于拉里,从拉里到西藏拉萨还有十多站未提及。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路段后来出现变化,所以王我师了解的情况已有所不同。色尔图上疏中谈到的“站”,也应既指塘铺又包括汛,甚至还包括粮台、军台。王我师与色尔图均谈到康熙末年川藏道上汛塘甚至粮台总的设置情况,后者还言及塘兵总的配置情况,但沿途各汛塘及粮台当时的具体情况仍不太清楚。

最早对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川藏道上所设汛塘与粮台情况作较全面记载的是清代西藏早期方志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乾隆《西藏志考》。前者虽然刊行于乾隆元年,但修纂开局于雍正年间,因而所收材料多是雍正年间的,当然包括康熙末年的材料;后者虽无明确成书年代,但从其内容材料的下限看成书时间应在乾隆元年下半年或次年初,故其材料也基本是雍正年间及康熙时期的。^②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以打箭炉开始,沿川藏道一路向西到拉萨,采取先分地再分目的方式记各地情况,记述中均设有“塘铺”一目专记各地的塘铺。如起点打箭炉设置的塘铺就有沈抗、柳场、大藏、折多、提茹、恶洛、卧龙石、八角楼、中渡等9个。里塘塘铺除记13个塘铺及所驻兵丁外,还记“共有土兵二百八十名”。之后,沿途记巴塘塘铺、乍丫塘铺、叉木多塘铺、类伍齐塘铺、洛隆宗塘铺、硕般多塘铺、达隆宗塘铺、拉里塘铺及工布江达塘铺,最后为西藏之塘铺。其记载表明,以上各地都设有数量不等的塘铺,各塘铺所驻兵丁也不同,有的还有土兵。在西藏11个塘铺后又记有“新设铺站”7个。所谓“新设铺站”,其设置时间应是在雍正《四川通志》开局修纂之后。

清代自打箭炉至西藏道路有南、北、中三条路线。从以上塘铺记载看,主要是南线,即前已提及的驻藏大臣往返路线,也就是清代进出藏者一般说的川藏道。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中有关川藏道沿路塘铺的情况看,其记载是较为详细的,反映了雍正时期甚至康熙末年川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4、275页。

^② 关于《西藏志考》的成书年代,参见赵心愚:《〈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藏道上各地塘铺的设置及塘兵的配置,尽管有些情况也未记全,但非常有价值,之后的《卫藏图识》等显然已注意到其价值,所以编纂时加以充分利用。分析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的记载,可认为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具体时间应在雍正十一年即此部通志开始修纂或稍前。正因为这一原因,以上记载与稍后的《西藏志考》《西藏志》所记已出现一些不同之处,但是除了将打箭炉东的几处塘铺及一些重复路段及支线塘铺也一并记入外,从打箭炉至西藏多地重要的塘铺与后来的相关记载也大致相同,只是一些地名用字不同,当然也可能有一些路段在雍正后期又有所调整。但是,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对川藏道汛及粮台的记载并不集中,有关情况分别记入各地“城池”“职官”“公署”等目中。相比之下,《西藏志考·台站粮务》对汛及粮台的情况有较集中的记载。其记载称:“自打箭炉至藏,共设塘站八十四处,汛兵十三处,粮务六处。塘站详载于路程篇中。汛地十五处:拨浪工,把总一员,兵十名;里塘,把总一员,兵二十五名;海子塘,兵八名;立登三坝,兵十名;大所,兵十名;巴塘,把总一员,兵五十名;江卡,把总一员,兵二十名;黎树,兵二十名;石板沟,兵八名;阿足,把总一员,兵五十名;乍丫,把总一员,兵三十名;昌都,把总一员,兵二十八名;说般多,把总一员,兵五十名;拉里,把总一员,兵二十六名;江达,守备一员,兵一百二十名,后减驻昌都。粮务六处:打箭炉、里塘、巴塘、乍丫、昌都、西藏。”打箭炉周边所设汛此目未记。应注意的是,《西藏志考·台站粮务》在具体记汛地与粮务前的一小段文字中本有一误,即“汛兵十三处”应为“汛兵十五处”,因为之后又言“汛地十五处”,而且其实际所记也为十五处。但之后的《西藏志》在其基础上修改整理时未发现此误,同时又删去“汛地十五处”一语,并将文字改作“安汛十三处”。后之史志便辗转传抄以讹传讹,皆作“安汛十三处”。如前所述,早期西藏方志中并不称“粮台”,而称“粮务”,其衙门称为“粮务署”,从《西藏志》开始才记为“粮台”。设在乍丫的粮台乾隆十一年后改设拉里,最早对这一变化作出记载的西藏地方志是陈克绳《西域遗闻》。从陈克绳所言“向于乍丫设粮务”一语来看,乍丫设粮务时间应较早,但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记里塘中有“粮务署”而有关乍丫的记载中未见“粮务署”,这说明乍丫粮台设置时间有可能在雍正后期。^①乍丫粮台如此,其他几个粮台中有的设置时间也有可能是如此。

打箭炉至西藏拉萨路程共计“四千八百八十五里”。^②在这样超长距离且崎岖难行的高原路程中,清通过沿途众多汛塘、粮台的设置,保证了内地与西藏之间这一交通大动脉的正常通行。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所记川藏道上所设站数除去前已谈及的不应计入的塘铺外,也要多于《西藏志考》所记的“八十四处”和王我师所说的“八十七站”,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形势变化下,川藏道上塘铺的设置也应在不断调整,而且当时的道路也有改道的情况。

二、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特点及其认识

清代入藏的青藏、川藏及滇藏三条大道,由于起点及沿路条件不同,其具体情况与保障通行的措施也各不相同。根据史志文献的记载,以下对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时间、相关特点

^① 乾隆《西域遗闻》,1936年禹贡学会铅印本。此志关于乍丫粮务改设于拉里的记载及相关分析,见赵心愚:《乾隆〈西域遗闻〉资料的三个主要来源》,《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此语见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西藏志·程站》中,记打箭炉至拉萨共计4780里。见乾隆《西藏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路程距离记载出现不同,可能与道路改道有关,但也可称约五千里。

及性质与职能做一分析并谈谈相关认识。

(一)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时间

认为川藏道上的汛塘、粮台在康熙时期已设置的看法并无大误,但显然过于笼统,究竟何时设置仍需要探讨,因为这关系到川藏道这一重要通道清代何时开通。截至目前,研究者多将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与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联系起来,认为清代驻藏驿传制度建立及驿站(包括汛塘、粮台)设置时间为康熙五十八年,也就是清康熙帝决定再次用兵西藏之时。^①这样看当然有一定理由,但若与康熙帝决定出兵西藏联系起来,由川藏道派兵实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当然也可能认为,由川藏道出兵之前已提前进行了设置准备。认为康熙五十八年在川藏道设汛塘、粮台的看法清代早已出现,王我师所著《藏炉总记》就持这样的看法。但从文献看,认为康熙五十八年川藏道开始设置汛塘与粮台的看法实际上也存在问题,只是一种带推测性的说法。《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七年六月有一材料:“兵部议复,‘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言:‘里塘地方,今因拉藏被害,无所统属。臣等飞咨护军统领温普等速选满、汉官兵前赴里塘驻防。请设驿站、以速军机。自打箭炉以至里塘,应添十站。每站设马六匹。照打箭炉养马之例、倍付草料、另拨银两支給。’应如所请。’从之。”^②从此条材料看,清官员提出从打箭炉至里塘设置塘站的建议已在康熙五十八年之前。这一建议虽得到康熙帝批准,但进展可能不太顺利,所以康熙五十八年二月都统法喇等又上疏言招抚里塘地方事。^③尽管如此,从打箭炉至里塘的塘站在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建议提出不久当有部分已经设置。

据雍正《四川通志》的记载,清军在攻取打箭炉后于康熙四十一年调东路站马六匹、马夫三名,在打箭炉城中早已设打箭炉驿,并在打箭炉以东和以西设置了铺递。^④有研究者据此记载已指出,康区塘汛设置时间为康熙四十一年。^⑤笔者赞同这一看法,并想补充一点,即打箭炉铺递的设置,尤其是打箭炉以西铺递设置实际上是川藏道驿站、汛塘设置的一部分,因此川藏道塘站开始设置时间可明确为康熙四十一年。当然,这只是川藏道起点地区塘站的设置,而且也只是川藏道汛塘开始设置的时间。前已谈及的康熙五十八年设置实际上也只是部分地区汛塘的设置,因为驱逐准噶尔军队行动中走川藏道的南路清军在康熙五十九年四月正式行动,于当年八月才攻入拉萨,所以在康熙五十八年不可能完成川藏道上所有汛塘的设置。《清圣祖实录》中还有一条材料非常重要,可证明康熙五十八年之前川藏道上军台或粮台的设置已经开始。其记载称:“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打箭炉地方外通西藏。内皆高山峻岭。实为天设之险。皇上救援西藏、令护军统领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臣以炉地素不产米,山路险远、粮运为难。动支库银、买米一万石,遴选人员,先运六千石抵炉。余米收贮雅州。如有需用、再行酌运。……自此源源买运、必不迟误军需。’”年羹尧康熙五十七年三月提出的建议得到采纳,康熙皇帝称其“实心效力,殊属可嘉”。^⑥这一建议采纳之后,随着满兵驻扎打箭炉,采运储备军

① 国庆:《清代藏区驿传制度蠡测》,《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古代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冯智:《清代治藏军事研究》第十一章《清军在藏区的驿传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275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13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二月辛未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21、222页。

④ 雍正《四川通志》卷22下《驿传》《铺递》,四库全书本。

⑤ 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此文重点探讨清代前期康区的塘汛,未涉及粮台。

⑥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丙寅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07、208页。

粮的军台、粮台也就在川藏道正式出现,尽管其职能可能与之后的粮台有所不同,但川藏道粮台设置时间可明确在这一年。^① 总之,根据史志记载,可以认为康熙四十一年已开始在川藏道上设置塘站,并至迟在康熙五十七年上半年已在川藏道上正式设军台或粮台。设置开始较早,但非一次性完成,是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二)川藏道汛塘、粮台设置的几个具体特点

前面所言的时间跨度较大实际上已是一个特点。除此之外,其设置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具体特点:

其一,汛塘、粮台的设置主要在南线,首先注意的是采购粮食、催办夫马的条件而非路程远近与是否平坦。自打箭炉至西藏的南、北、中三条路线中,汛塘、粮台主要设置在南线,但从路程来看南线并非是捷径,事实上其路程比北、中两线均要远,而且道路崎岖难行。《西藏志考·程途全载》记有“自打箭炉由霍耳磔革草地至察木多路程”,此路线共计三十九站,一千七百八十里。《西藏志考》编者在最后有这样一段话:“道路平坦,草广柴微。此一带番民多住黑帐房,以牧放为生。微有烟瘴。”在记成都起程由打箭炉、察木多至藏路程后,编者也写了一段话,最后几句为:“风能拔树飞沙,岭堪接天插汉,有万状崎岖之路,无十里平坦之程,怪石磷磷如虎踞,溪流曲曲似龙盘。历斯土者,诚为劳矣!”若以路程远近,前一条路至察木多比后一路线至察木多要近一千里左右,道路情况从编者所言来看前者也显然好走得更多。为何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要设置于南线呢? 关键原因在于南线沿途居民相对稠密,催办夫马、采购粮食具有较好条件。当然,还可能因南线相对安全等。

其二,汛塘、粮台的设置其相互间的距离在四川和西藏两地存在着明显不同,前者间隔距离小而后者则显然较大。这一特点已有研究者谈及,但未对其原因进一步作说明。^② 实际上,这一特点在康熙、雍正时期已出现。换言之,即这一具体特点是在川藏道汛塘、粮台开始设置之时就已基本形成。据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载,“雍正五年三月,副都统鄂齐、内阁学士班第、四川提督周瑛前往巴塘、察木多一带指授赏给达赖喇嘛地方疆界。五月,抵巴塘会勘,巴塘邦木与赏给西藏之南登中有山名宁静,拟于山顶立界碑……以内均为内地,巴塘所属,山之外悉隶西藏,达赖喇嘛所管。”这次勘界之后,明确了四川西藏行政分界。尽管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仍从打箭炉开始记,但之后的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则从南登以西的江卡开始记,因为其编纂者认为行政区域划界之后《西域志》应记西藏所辖地,巴塘及以东不应再记入。^③ 康熙末年用兵西藏时,川藏道最初设置汛塘、粮台已是根据沿途具体情况确定地点,由于川藏居住者分布情况不同,自然条件与地形不同,汛塘间、粮台间的距离也就不可能相同,江卡以西就已显间隔距离大。雍正五年川藏两地行政划界后,自打箭炉至江卡的路程要比江卡至西藏拉萨的路程要短得多,因此出现在川与在藏两地汛塘、粮台间隔不一样的特点。这一具体特点的存在,实际上反映出清代川藏道是以四川作为重要战略依托,当然也反映出当时川藏两地的

① 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认为,年羹尧此建议被采纳后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为满兵“西移驻打箭炉开始”。在此之前,仅有绿营兵驻守。

② 孟秋丽:《舆图中的川藏交通——解读清末彩绘地图《西藏全图》》,任新建、周源主编:《任乃强先生纪念文字——任乃强与康藏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文作者是对川藏道上站与站的距离谈此看法的,实际上汛塘、粮台的距离更是如此。

③ 嘉庆《四川通志》卷191《西域志一》,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其志卷首小序中,明确言“西域”的边界在南登以西。

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

其三,汛塘设置之初已有土兵在部分塘中,土司及其土兵在汛塘开始设置时就在为这一交通线服务,是保障川藏道畅通的重要力量。有研究者已指出康区塘汛中有“蛮塘”,塘兵中有“番兵”。^①指出这一点有重要意义。笔者对雍正时期川西高原土司设置已做过分析。^②在这里想补充说明,“蛮塘”“番兵”在川藏道上至迟雍正时期已出现,因为此时这一地区土司已正式设置。在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的记载中,巴塘塘铺、乍丫塘铺、洛隆宗塘铺、硕般多塘铺都有一些土兵在塘中,一般每塘二名,也有的塘有三四名。在记里塘塘铺时没有分记各塘土兵数,但最后有“共有土兵二百八十名”一语,说明里塘各塘铺中安排的土兵应较多。从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所附“自成都府至西藏路程”所记看,以上决不是无依据的推测,如在麻盖中、西恶洛、咱马拉、里塘诸塘中,均记有“番兵”或土兵五名。从《清实录》中的材料看,川藏道上汛塘中的“番兵”“蛮塘”也有可能康熙末年已有了。康熙六十一年署理四川巡抚色尔图疏言中,就有“臣通计各站酌量驻兵,并将土司番兵亦添入数内,一同驻扎,共需兵一千九百名”。^③色尔图的这一建议得到康熙帝最后批准。根据这一记载,康熙末年川藏道至少部分塘站中就有了土兵,有的塘也可能全安排为土兵,即所谓“蛮塘”。^④在《西藏志考》所记打箭炉至西藏路程中,有的站只记有土百户、土官、土司等,未作进一步详记。在嘉庆《卫藏通志·程站》所记路程同一站的记载里,则明确记土百户“供役,给柴草,换乌拉”或“明正土司供役”“里塘土官供役”。^⑤尽管《卫藏通志》成书已晚了几十年,但所记情况实际上至迟雍正时期已是如此。这一具体特点反映了沿途土司在汛塘、粮台设置之初已为川藏道的运行服务,沿路的藏族同胞也为川藏道畅通做出了贡献。

其四,沿路汛塘的分布与粮台的分布存在着密切关系。川藏道经过地区不同于内地,自然、社会情况均复杂,安全畅通不仅关系到川藏道本身,也事关西藏地区的稳定,所以整个川藏道包括汛塘、粮台的设置与清中央政府在川、藏两地的驻军及沿路土司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西南其他地区汛塘设置及青藏、滇藏两道相关情况比较,这也是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设置的一个具体特点。本文在之后汛塘、粮台性质与职能的讨论中还将谈及这一特点。

(三)川藏道汛塘、粮台的性质与职能

在已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中,研究者多从驿道运输和驿传制度角度去审视、分析清代川藏道上汛塘、粮台的设置及管理。但分析史志所载,川藏道上的汛塘、粮台的性质、职能应是多方面的。首先,川藏道汛塘、粮台及其整个体系具有驿站、驿道的性质与职能。驿站的出现是因为军情官方文书需要传递。有若干驿站沿途设置的交通线,即所谓驿道。清代川藏道自康熙末年开通之时,首先就已具有驿道的性质与职能。四川巡抚年羹尧在康熙五十七年六月一奏书中言:“臣等飞咨护军统领温普等速选满、官兵,前赴里塘驻防。请设驿站,以速军机。”^⑥从

① 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

② 赵心愚:《雍正时期清政府在川西高原设置土司的行动及特点》,《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此文分析了雍正时期土司设置后所纳贡赋,但未涉及派塘汛土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74页。

④ 道光《巴塘志略·塘汛》中即有全为土兵的塘。尽管此志成书较晚,但所记土兵塘应早已出现。道光《巴塘志略》,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年油印本。

⑤ 嘉庆《卫藏通志》卷4《程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 《清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六月辛丑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213页。

其所言看,川藏道当时及之后所谓的汛塘的确有驿站或明显具有驿站性质、职能。沿线设置后,这一大道也就成为驿道。雍正时期,为了川藏道的畅通及西藏地区的稳定,清中央政府同意四川官员的建议加强这一重要驿道建设。《清世宗实录》载:工部议复“四川巡抚宪德疏言:‘官兵移驻打箭炉,凡噶达与三渡、吹音堡各处设有营伍。自应安排塘铺,以便递送公文。盘诘奸宄,计共五十五塘,并请修理塘房、烟墩、哨楼等项。’应如所请”。^① 此上疏中明确言安排塘铺“以便递送公文。盘诘奸宄”,即指出了汛塘的性质与职能,实际上也主要是驿站的性质与职能。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所附“自成都府至西藏路程”,记里塘西恶洛塘站为“西恶洛起过小山,俱系丧沟道。水、草、柴俱有,无人户,有坐塘兵三名并番兵五名传递文书”。从这一记载也可看出川藏道塘站的驿站性质与职能。正是由于清代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均重视川藏道并发挥其作用,所以这一重要驿道及沿途驿站能运转,通行基本得到保证。由于沿途驿站能运转,紧急情况下清中央政府及皇帝一个月左右可知西藏发生某事,其中驻藏大臣奏折自拉萨传递至成都约需要十六七天。^② 尽管这是乾隆十几年的情况,但雍正时期应大体如此,这也是雍正时能迅速出兵并妥善处理西藏内乱的原因。

其次,川藏道上的汛塘,甚至粮台又明显具有军事据点性质与职能。清代的绿营兵是常备军,其管制有标、协、营、汛四级,标、协下辖1—5营不等,营之下为汛,汛之下则为塘。一般情况下,汛由千总、把总、外委等低级军官统领但也有守备统率的汛。据雍正《四川通志·兵制》记载,清在泰宁(噶达)驻扎有绿营兵泰宁协,下辖营,其中德靖营驻中渡,分防上渡汛、下渡汛。阜和营驻扎打箭炉城,分防打箭炉汛、远庙汛,宁安或驻扎灵雀寺。^③ 这几营及汛《西藏志考·台站粮务》中未记,但其设置与川藏道实有重要关系。据雍正《四川通志·兵制》记载,各汛塘之兵均由各营酌派,由各营负责安设汛塘并使之声援联系。自打箭炉至南登的塘站也就是汛塘及粮台,乾隆初由打箭炉同知、阜和营游击每年春秋二季轮派督察。^④ 尽管这也是乾隆时的情况,但此记载实际上说明打箭炉以西至南登各站由四川从绿营派出汛塘兵,阜和营有其督促检查责任。南登以西至拉萨则为驻藏大臣直接辖理,其汛塘兵应是从驻藏绿营兵派出。驻军与汛塘、粮台相互声援联络,军事职能主要就是镇守与控制沿路地区。由于自打箭炉至拉萨沿途多为土司地,沿川藏线设立汛塘、粮台这样的军事据点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为了确保川藏道的通行,同时还有管控沿路土司及确保康区及西藏重要地区稳定的战略考虑。

其三,川藏道上的粮台还具有一定的地方政府性质与职能。粮台的基本职能在“粮务,即与粮饷有关,但事实上还有值得注意的性质与职能”。任乃强《西康图识》中曾依据嘉庆《四川通志·土司志》有关记载对粮务谈了如此看法,并对沿途部分土司作了介绍,其中就有“里塘粮务属”及“巴塘粮务属”的土司,并指出“其西康各土司户籍,则由雅州之打箭炉同知衙门掌管。各土司之贡赋征调,则分掌于……里塘、巴塘二粮务衙门”。在谈到巴塘时,任乃强先生又称其地“清为巴塘粮台”。^⑤ 笔者想补充指出的是,里塘、巴塘等粮台的职能在设置之初就并非只是收集、转运粮饷,各土司贡赋征调,甚至钤辖土司之责早已如此。钱召棠《巴塘志略·粮务题名》载,巴塘于雍正元年(1723)设立粮台,乾隆十年左右虽“随师捲撤”,但很快又得到恢复。雍

① 《清世宗实录》卷93,雍正八年四月戊申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341页。

②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页。

③ 雍正《四川通志》卷22中《兵制》。

④ 《清高宗实录》卷234,乾隆十年二月乙巳条;《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一集,第479页。

⑤ 任乃强:《西康图经》,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29、78页。

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在里塘的记载中,“公署”目里明确有“粮务署”,具体记载为:“碉楼一座,在长青春科儿寺之左”。这也说明,里塘粮台也是在雍正年间就已设置了。据《里塘志略·职官》记载,里塘粮务要“管理供应差务,钤辖土司,支放汉土官兵粮饷”。并记驻里塘守备职责是“统领汉土官兵防守地方,查缉盗贼”。^①“钤辖土司”显然与粮饷转运管理关系不大,而是辖区内土司的边远地区州县长官的职责。巴塘粮务亦有一重要职责,据《巴塘志略·职官》记载,当巴塘土官“遇有缺出,照流官例由粮务会同营员拣选著有劳绩,番众悦服之头人、土舍取具保结,移送打箭炉厅转详咨达,颁给号纸承充”,这实际上规定粮务拥有一定的当地土官的考察权与选拔权,与里塘粮务“钤辖土司”是一致的,也是辖区内土司的边远地区州县长官的职责。《巴塘志略·风俗》中明确记载,当地七月中旬收割青稞,具体收割时间土司提出后需要先“稟知粮台,示出晓谕三日”之后再开始收割。这实际上反映出粮务对当地经济活动亦有决定权。《巴塘志略·游览》记当地的柳林,“春时,土司请台站文武校阅番兵骑射于此”。这实际上也反映出粮务等对当地土司武装亦有一定的监督权。《里塘志略》与《巴塘志略》皆设有“疆域”目,其地与之后的里塘、巴塘两县辖区大部分同,将其记入所纂地方志,正说明粮务亦有一定的地方管辖范围。因此,《西康建省记》在其《西康郡县记》篇谈及巴安府(即今巴塘)时称,“原设巴塘粮务一员”,^②即指其地原为巴塘粮务管辖范围。粮务是清代在巴塘、里塘最早设置的流官,在川藏道所经高原地区未置州县的情况下,雍正年间设置的粮台在负责粮饷事务的同时显然还要负责管理当地的一些具体事务,这实际上就使粮台具有了一部分地方政府职能,其性质显然就不单单是负责粮饷转运的机构了。总之,清代川藏道所经地区不同内地,汛塘、粮台具有多方面的性质与职能,对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及之后康区沿路正式置州县亦产生了一定历史影响,在西藏历史与康区历史研究中应注意其历史作用。

三、结 语

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川藏道所设汛塘、粮台具有多方面的性质与职能,有力保证了清治藏战略的实施及用兵西藏与加强西藏治理之需,为之后此交通要道的长期运行、管理亦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与康区均有着重要意义。康熙末年及雍正时期川藏道开拓后成为清治理西藏的战略依托,其重心也逐渐向康区转移。^③沿路汛塘、粮台的设置,则是内地与西藏间这一交通要道管理与运行的保障。清代的实录、档案、史籍及其他文献著作中对这一时期川藏道汛塘、粮台的设置情况记载很少,有的虽然也有所提及,但并未留下较为系统、完整的记载。值得庆幸的是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可补实录、档案、史籍等记载之不足。在截至目前的清代川藏道汛塘、粮台设置的研究中,多只是依据乾隆后期甚至光绪年间的史志与《清会典事例》,对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或根本未提及,或未注意发掘利用志中的相关材料。本文的写作史志结合,充分利用早期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的相关资料,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在相关研究中注意发掘利用早期西藏方志中包括川藏交通等各类资料。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嘉庆《里塘志略·职官》,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版。

② 傅嵩林:《西康建省记·西康郡县记》,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四川官印刷局1912年印本。

③ 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中山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此文主要探讨川藏道的开拓,沿路汛塘、粮台的设置则是这一交通要道管理与运行的保障。